

“大国小农”下云南农村改革的 困境与出路

陈晓未¹

【摘要】：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经历四十年的农村改革，全国小农户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关注的是，云南小农户呈现出了与全国迥然不同的特征和变化趋势，云南深化农村改革陷入了四重困境：一是工业化带不动农业现代化；二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难以有效对接；三是农民收入结构调整异常缓慢；四是农业弱质低效。云南农村改革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加快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步伐，提升城乡融合水平；质量兴农，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尤其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绿色化和特色化、农业品质化和品牌化发展。

【关键词】：农村改革 非农就业 农业现代化 三产融合 质量兴农 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4—0075—08

一、引言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决定着农村改革的走向。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末规模农业经营户仅占到农业经营户的1.9%。^①小农户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和主要组织形式^{②③}，补齐小农户这一占据农民大多数群体的发展短板，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需要。^④

十九大以来小农户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代会历史上第一次肯定“小农户”的地位和作用，特别要求“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1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就这一任务进行了详细部署，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必须要深入思考和全面对接小农户的生产生活状态。

截至2017年底，云南省90.03%的农户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不足10亩^⑤，每个第一产业劳动力所拥有的耕地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3.53%^⑥；全省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仅为20.8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16个百分点，这也使得云南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聚居区农地确权、流转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研究”（项目号：16BSH074）、云南省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云南农村改革40年实践经验研究”（项目号：18BFX034）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云南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晓未，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农村发展研究。

^①[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1563539.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1563539.html)。

^②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③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6期。

^④韩长赋：《积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求是》2018年第2期。

^⑤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的《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第1-2页有关数据计算，内部资料。

^⑥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8》表1-1、表15-8和《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4-1、表8-20计算而来。

的小农特征更加明显。^①值得重视的是，云南的小农户呈现出了与全国迥然不同的特征和变化趋势。现阶段中国小农户具有开放的生产系统、家庭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家庭经营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的比重显著下降、农户生产经营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等特征，^②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与上述特征不同的是：一方面，云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村领域，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排斥农民非农就业，农户生产经营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造成了农业的弱质低效；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调整异常缓慢，大大滞后于全国平均速度，这也决定了云南省深化农村改革面临的困境也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典型性。

二、重工业化影响了农民非农就业和农业高效发展

改革开放后，云南轻工业与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43：57升高到2002年的51.6：48.4。由于云南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一比例持续下降，2017年降为34.8：65.2。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且主要不是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服务的，其优先发展导致云南农业长期很难改变弱质的面貌，轻工业也不能快速发展，进而导致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严重不足、第一产业滞留过多劳动力且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后果。^③

（一）第一产业滞留过多劳动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固化在农业上，难以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上，这集中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上。2017年云南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仍高达14.28%，比1978年的42.66%下降了28.38个百分点；^④而同期全国从27.69%降低到7.92%^⑤，下降了19.77个百分点，这说明云南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尽管下降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占比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来看，全国从1978年的70.53%降低到2017年的27.00%，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此相比，云南只从86.10%下降到50.75%。也就是说，改革之初云南第一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5.57个百分点，40年后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23.75个百分点，值得重视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净减少了7374万人，而云南则净增加了387.82万人。也就是说，云南就业结构变化的速度远远滞后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大量劳动力仍然被禁锢在农业上。^⑥

（二）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带动农业发展

轻工业作为生产满足人民生活消费需求的产业，具有投入产出比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社会带动面广、能源消耗低等独特优势。轻工业分为以农产品为原料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型，前者不仅能够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且能够重塑第一产业的生产规模、现代化程度，所以，轻工业的发展能在很大程度上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大幅提高农业产值，吸纳农业转移劳动力。以云南优势原料农产品——甘蔗为例，1978-2017年，云南甘蔗总产量从160.01万吨增加到1718.78万吨，增长了9.74倍，年均增长速度为6.12%；与此同时，全省糖产量从13.49万吨增加到227.13万吨，增长了15.84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31%，增长幅度和速度与甘蔗产量呈现出很好的协调性。同样的趋势也体现在橡胶、咖啡、烟草等商品性很高的农产品上。如此看来，轻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收益及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整个农业进行塑造。凡是轻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相关农产品的生产也会有较快发展。^⑦

然而，云南工业的快速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整个工业的协调发展，而主要是重工业的单兵突进。尽管全省工业在“大

^①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提供的《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第1-2页有关数据计算，内部资料。

^②杜鹰：《小农生产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0期。

^③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8》表8-1计算而来。

^④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8》表2-1计算而来。

^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3-1计算而来。

^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4-2和《云南统计年鉴2018》表15-9计算而来。

跃进”期间经过了一个短暂的“繁荣”后迅速滑坡，但重工业却在国防工业的带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1950年，全省重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36.0%，1960年迅速攀升到了56.4%，1970年继续上升到66.8%，1980年下降到54.8%，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47.5%，但1994年后持续上升，2000年恢复到了49.5%，到2017年已经提高到65.2%。云南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致使轻、重工业比例失衡，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使轻工业生产不能为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提供发展空间，造成农业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都很短；另一方面，也造成工业内部比例不协调，降低整个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率。

三、小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难以有机衔接

2018年9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强调要将传统生产要素中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有机结合，从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主要从两个方面发生作用，一是通过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层次，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让小农户分享到改革发展的红利；二是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小农户的专业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水平。

农业产业化是突破工农脱节、城乡分割的关键所在，是使资源要素导入农业农村、促进城乡良性互动的有效通道。云南农业产业化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以下几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一）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短，附加值低

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构建主要依托特色资源、特色产品、特色产业的培育，以生成辐射带动作用大、市场占有率高和附加值高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并通过涉农工业及涉农服务业向传统农业延伸，通过一二三次产业的联动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产业结构。从云南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纵向分布看，除卷烟企业外的绝大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均处于资源初加工阶段，以数量扩张和薄利多销为主，其中，以基地种养业为主要领域的农业企业所占比重为60%，主要为省外乃至国外的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新产品研发能力差，产品附加值低，蔬菜、食用菌、家禽等精深加工水平不高。“有原料无加工，有加工无原料”的现状较为突出，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有待加强。2017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仅为0.72：1.0，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1.0，更无法与山东、浙江、江苏的7.4：1、6.1：1和4.6：1水平相比。^②

从农业龙头企业分布看，区域的互补性和协作性差。如为了获得较高的税利，有一个时期各州（市）都想上卷烟厂，随后虽经过整合，但行业垄断仍十分突出。其他行业的龙头企业则划地为牢，不仅规模小、集中度低，而且产品单一、档次低、技术研发严重滞后，这尤其表现在茶叶、甘蔗、核桃等农产品的加工上。同时，区域分布很不均衡。以2015年为例，昆明市的农业龙头企业为113家，占到全省的3.45%；实现产值381.79亿元，占到全省的18.85%；销售收入469.80亿元，占全省的23.88%，这说明龙头企业分布仍然以昆明市为主。^③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已经逐渐由单项农业生产服务转向资金、信息、技术、储存、加工、运输、销售等综合性农业服务，由于政府涉农机构公益性服务职能缺失，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化供给主体主要提供营利性经营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由于经济效益不高、管理不规范等因素，服务能力不强；农业科研教育单位提供的服务与农民的实际需要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种种因素导致小农户难以从现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获得支撑。

^①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8》表7-16、表8-8计算而来。

^②王敏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全力推进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在2018年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云南农业》2018年第3期。

^③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业与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工作手册（2016年度）》，内部资料，第15-20页。

从销售渠道来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17年在全省15个州（市）进行了专项调研，针对云南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16种主要农产品中，有9种农产品主要依靠农户自己拿到街上售卖，有6种农产品主要依靠贩子上门收购，仅有1种农产品由签过协议的龙头企业收购，没有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来，农户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单打独斗的局面，除了极少数如卷烟、橡胶等加工率高的农产品以外，绝大多数农产品依然主要以初级农产品的形式售卖，农户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难以获得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利润返还。

在农机具使用方面，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农户有使用农业机械的需求时，82.1%的农业机械由亲戚朋友提供；其次是由专业大户提供，所占比例为10.2%。在有偿提供服务方面，亲友提供所占比例仍然高达60.9%，专业大户所占比例为23.0%，公司占13.6%，政府和合作社所起的作用较小，分别为2.0%和0.5%。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2017年，全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面积只有839964.2亩，仅占1.71%，且主要分布在昆明市（103273.2亩）、曲靖市（240595.7亩）、保山市（84284.1亩）、普洱市（93205.7亩）和大理州（161588.7亩）；承担托管服务的组织仅有2353个，享受托管服务的农户数仅为223161户。^①

四、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调整异常缓慢^②

改革开放40年来，家庭经营性收入始终是云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又主要来自第一产业，农民增收渠道非常单一，这既是云南农民收入结构的基本特征，又是农民增收乏力的主要原因。

（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调整速度远远慢于全国农村居民

1978年，云南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大体一致，其工资性收入占比为60.31%，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为31.39%；全国的这两个占比分别为66.09%和26.80%，云南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78个百分点，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高出了4.59个百分点。之后，云南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大幅增加到1985年的79.88%，随后又缓慢降低到2017年的54.89%，而工资性收入占比从1985年的10.65%缓慢增长到2008年的19.88%，2009年到2017年期间，云南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增长加快，但2017年占比也仅达到28.34%。与此同时，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从1985年的74.45%逐年降低到2017年的37.43%，工资性收入则从1985年18.16%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40.93%。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2009年到2014年期间，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并驾齐驱；2015年起，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全国农村居民的最主要收入来源，而云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则一直还是效益较低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这实际上也是云南农民增收更加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云南农村居民收入的结构调整速度远远慢于全国农村居民。

（二）第一产业几乎成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以来，云南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中，尽管第一产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的绝对值都在逐年增长，但第一产业收入不仅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所占比重均超过85%，由1993年的86.49%增加到2010年的91.16%，进而微弱下降到2017年的83.32%。如果从第一产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贡献来看，第一产业收入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虽然起伏不定，但在波动中仍然保持高位，贡献率由1994年的81.5%增加到2016年的99.9%，2017年降为86.45%，这也进一步说明云南农村劳动力日益被禁锢在农业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日益萎缩。

（三）云南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①①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内部资料，第28-30页。

^②②此部分数据的农民收入结构分析，1978年到2012年数据系采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构成进行分析，2013年到2017年数据系采用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进行分析。2012年以前数据来自历年《云南统计年鉴》，2012年以来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云南调查年鉴》，2017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6-11、《云南调查年鉴2018》表1-7、表1-9、表1-39计算而来。

虽然云南通过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发展第二、三产业，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缓慢增加，如图 1 所示，但有一个数字令人吃惊，即从 1978 年到 1985 年短短的几年间，全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云南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比直到 2009 年才达到全国 1985 年的水平。这也解释了云南农村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迅速拉大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一是 1978 年到 1985 年间，全国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导致全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快速升高；而云南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且缓慢，未能带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①二是 2003 年以来，云南经济结构从轻重工业协调发展过渡到重工业化，轻工业一“烟”独大，由于卷烟工业的超常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其他轻工业的发展空间。重工业单兵突进，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挤出和排斥效应，导致农民增收困难。而云南农村居民所倚重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则属于产业链和价值链都较短、收益较低产业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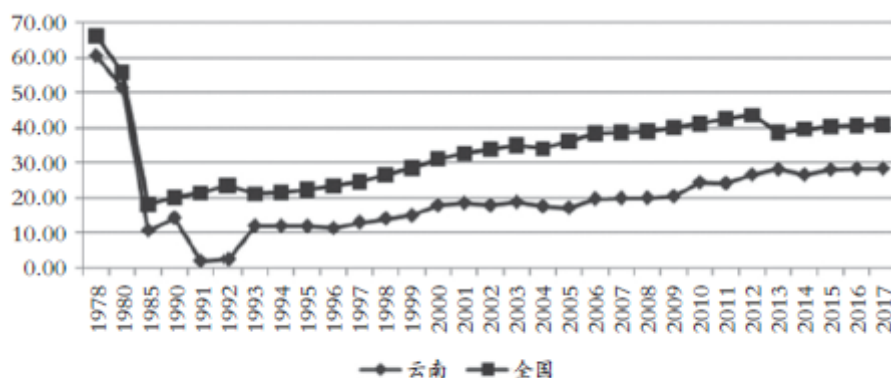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五、农业弱质低效^②

云南山高坡陡、耕地细碎化分布特征突出，使得云南农业的发展条件先天不足。由上文可知，第一产业的提质增效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如何在“后天”加强云南农业发展，一直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面临的难题。40 年来，云南农业经济效益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云南农业经济效益在全国处于什么的位置？需要做客观科学的评估。

农业经济系统属于灰色系统，各指标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很难直观地给出某地区报告期内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更难以对农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地区间的横向比较以及该地区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有鉴于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依据主导性、功能性、系统性、可行性等原则，避免重复性计算，笔者选取了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本产出率、技术产出率等 4 个主要指标来建立农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3，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加权函数法，对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诸因素进行关联分析。同时，为消除某一指标的权重过大或过小带来的影响，笔者依据指标的关联程度来确定权重，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云南不同时期的农业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排序和综合评价。

（一）模型设立

1. 确定参考数据列和比较数据列均记为 $X_i(t) = \{X_i(1), X_i(2), \dots, X_i(n)\}$

^①郑宝华：《就业结构钳制下的云南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

^②由于跨度很大，该部分数据根据历年《云南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来，其中，2017 年数据根据《云南统计年鉴 2018》表 2-1、表 3-5、表 7-2、表 7-8、表 7-18 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3-2、表 4-1、表 12-3、表 12-4、表 12-8、表 10-6 计算而来。

2. 变量的无量纲化

$$X_i(k) = \frac{X_i(k)}{X_i(l)}, \quad k=1, 2, \dots, n; \quad i=1, 2, \dots, m。$$

3. 求参考数据列 $X_0(t)$ 与各比较数据列 $X_i(t)$ 在各时刻的绝对差

$$\Delta_i(k) = |x_0(k) - x_i(k)|$$

4. 求最大绝对差与最小绝对差

$$\Delta_{\max} = \max_i \max_k |x_0(k) - x_i(k)|$$

$$\Delta_{\min} = \min_i \min_k |x_0(k) - x_i(k)|$$

5. 计算关联系数

$$\xi_i(k) = \frac{\min_i \min_k |x_0(k) - x_i(k)| + \rho \max_i \max_k |x_0(k) - x_i(k)|}{|x_0(k) - x_i(k)| + \rho \max_i \max_k |x_0(k) - x_i(k)|}$$

其中 ρ 为分辨系数，一般取 $\rho = 0.5$ 。

6. 计算灰色关联度

$$\eta_i = \frac{1}{n} \sum_{k=1}^n \xi_i(k)$$

将 η_i 作为比较序列 X_i 对参考序列 X_0 的关联度。

（二）农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

1. 第一产业经济效益呈波动性提升，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不稳

在做纵向比较时，为避免经济波动对指标标准值的影响，本文运用 1978-2017 年云南省各项农业经济指标的平均值作为参考数列，来测算云南不同年份农业经济效益的变动情况，并对影响云南农业经济发展效益的四个关键指标进行了关联分析。四

项指标均与云南农业经济效益有着较高的关联度，其中又以技术产出率的灰色关联度最大，资本产出率次之，土地生产率排第三，最小为劳动生产率。这说明改革发展40年来，技术支撑对于不同时期云南农业经济效益影响最大，固定资产投资次之，土地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排第三，劳动力的素质和投入因素排最后，这与笔者前面所做的判断——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基本相符。

利用以各指标灰色关联度水平确定的权重，计算云南各个年份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如图2所示。1978年以来，虽然云南农业经济效益总体趋高，从1978年的0.37296增长到2017年的2.355628，但细看各年度的评价指数就会发现，农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数的走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1978-1986年），农业经济效益迅速提高，个别年份有所下降；第二阶段（1987-1995年），农业经济效益跌宕起伏，总体停滞不前；第三阶段（1996-2003年），农业经济效益止跌回升，有小幅提高；第四阶段（2004年至今），农业经济效益逐年大幅攀升，2017年达到最高。由此说明：2003年以前，云南农业经济增长基础不稳，分别在1983年、1986年、1993年达到几个小高峰，而其他年份却明显回落。2003年以来，随着农业税费的减免，以及一系列强惠农政策措施的出台，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农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基础不断夯实。2011年以来，云南实施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战略，更加突出比较优势，农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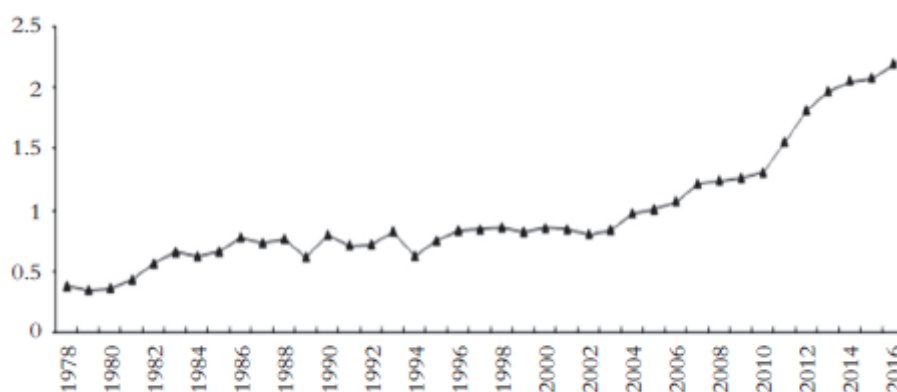


图2 云南省农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价值变动趋势

2. 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云南农业经济效益仍然偏低

为了测算云南省的农业经济效益在全国的位置，笔者以2017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各项经济指标的平均值作为参考数列，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不同地区农业经济效益评价价值。

运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对2008年、2012年的农业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在此不列过程）。测算结果表明，云南农业经济效益较为低下。2008年居于全国倒数第2位，综合评价价值为0.4795，2012年上升到全国的第18位，综合评价价值为0.8485，2017年为0.603678，排名下滑到第22位，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全国最好的上海市的13.64%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的60.37%，比最差的西藏自治区高出了46.97%。以上不同年份的数据说明，2008年以来，云南农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但2012年以后又有所下降，这与云南优越的农业资源和农业发展条件很不匹配。

（1）劳动生产率。2017年，云南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值在全国排名为倒数第4位，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13%。这说明云南第一产业存在着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十分艰巨，发展就业带动力大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迫在眉睫。实地调查也发现，由于土地价值低下，农村全劳动力要么常年在外打工，要么一年仅在家呆两三个月；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往往是年纪大的半劳动力，他们运用新型农业技术的能力低，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低，普遍采用传统的耕作方法种植传统农作物，所以在农产品的选择上多以不费劳动力、不需要精耕细作的品种为主，这就造成了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换句话说，从统计数据上看云南仍然有大量劳动力在从事第一产业，但实际上是以老人、小孩和妇女为主，他们的生产效率较低。

(2) 土地产出率。云南亩均农作物播种面积的产值为2919.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4280.1元的68.21%，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排名为第23位。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单一，以分散的小农户为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的作用有限，农作物种植结构仍以低附加值、低经济价值、传统的农产品为主，加之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短，附加值低，难以有效实现土地产出增值。此外，土地质量差，耕地资源分布不均衡，细碎化严重，适宜机械化、连片规模经营的土地十分有限，大型农业机械难以使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导致土地产出率更加低下。

(3) 资本产出率和技术产出率。对2012年云南农业经济效益测算的结果表明，云南农业的资本产出率位于全国第7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4.6%；可是到了2017年，云南农业的资本产出率滑落到全国第21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5.70%。2017年，云南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产出水平排名全国第17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3.05%。这说明，云南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不高，迫切需要优化配置，增加农业机械使用，能大幅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六、对策与出路

纵观云南农村改革40年的历程，无论从时间上、路径上、强度上抑或是内在逻辑上看，均表现出与全国农村改革广度和深度的一致性。虽然云南农村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认真梳理和审视就会发现，基于特定的农业生产环境和社会发育程度，云南农村改革表现出完全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性，需要花大力气破解，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一）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

云南农业弱质，农民贫穷，农村落后，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三农”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应从战略高度将三产融合发展作为推动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带动“三农”发展的重要抓手，扭转云南多年来轻重工业发展比例失衡、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状况。同时，云南省确立的八大重点产业都与轻工业相关。未来如何让整个与乡村振兴相关的产业来带动云南县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值得重点考虑。

（二）加快城镇化步伐，提升城乡融合水平

以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统筹城乡发展，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提升云南城镇化水平，完善农民创业创新保障机制，扩大就业渠道，将是云南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并稳定到城市的重要路径，也是解决云南“三农”问题的方向。值得考虑的是，未来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的政策空间已经很小，如何为城市资本下乡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是解决制约资本要素流动障碍的关键。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地方政府如何准确解读国家政策，配合做好前期工作，为城市生产要素顺利进入农村提供更好的帮助，这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就云南州、市、县政府而言，要为工商资本到农村创造好的环境，为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开辟新的空间。据相关部门统计，云南土地流转面积只占到耕地承包面积的20%左右，全国平均水平为37%，因此，云南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质量兴农，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1. 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提高云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资本、“小规模+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生产托管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有效途径。对一些社会力量能够提供商品化服务的领域，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大力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机构和主体创新经营方式，实现“农民组织化+服务规模化”，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云南农业经营效益，是未来云南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2. 农业绿色化和特色化发展，是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的方向

增强农业经营体系活力，发展绿色农业，是云南农业发展方向，同时，大力发展以地方独特气候环境和独特种质资源所决定的特色化农业，是提高云南农业竞争力的重点。

3. 农业品质化和品牌化发展，是提高云南农业资本产出率和技术产出率的重要抓手

云南要加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培育和发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多样化农业新型业态，加大云南农业机械化的投入和推广，提升农产品品质，通过品质化来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增加农产品价值，同时，要促进品牌化发展，从而将低效的传统小农业改造成为高效的现代农业，应该能够极大地提升云南省农业的经济效益。